

## 光復初期探訪話舊

王康

臺灣光復，到今年十月二十五日整整二十二年，我來臺灣也有二十一年之久了。在此二十一年之中，我一直在報界濫竽充數。到臺灣時還是壯年，現已垂垂老矣，回首前塵影事，真有人生如夢之感。

我係於三十五年十一月五日代表新聞報自滬飛臺工作，不久就碰上二二八事變，接着臺灣長官公署撤銷，正式成立臺灣省政府，第一任主席就是現在的外交部長魏伯聰，現任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靜波先生那時是財政廳長。其後大陸局勢逆轉，共匪全面叛亂，陳故副總統辭修先生於三十八年一月初奉中央政府之命繼魏伯聰先生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三十八年底整個大陸淪陷，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來臺灣，開中國歷史未有的變局。我當時身為外勤記者，對上述的每件大事都會經在臺灣參加採訪。就職業的觀點而言，能有機會採訪此等重大新聞，當然是幸事；但就國家民族的利益而言，這不僅是最大的不幸，而且也是最大的歷史悲劇。

三十八年五月底上海淪陷，新聞報社長程滄

波先生、經理呂曉光先生及其他少數同仁均已先後離滬，有的先到香港，後來臺灣，有的直接來臺。我於六月初應馬星野先生之邀，進中央日報採訪組工作，其後王介生、郭琴舫、朱稼軒、邵德潤、陳學明諸兄也先後加入中央日報，使新聞報同仁又能再度共事，而德潤兄曾經一度榮任中央日報總編輯，更是新聞報在臺同仁的無上光榮，不過這些都是題外話，暫且不提。題目是光復初期，本文的範圍也只談上海淪陷以前的事，也就是我為上海新聞報工作的那一段時期。

三十四年十月底臺灣光復，新聞報特派謝爽秋兄來臺採訪，不久他奉報社之命回滬轉往日本工作，臺灣的發稿工作在爽秋兄離臺以後，係由張任飛兄兼任。任飛兄當時係中央社臺北分社採訪組長，他是用「費澤」的筆名代發通訊稿不發新聞電報，直到我來臺以後，任飛兄才擺脫新聞報「地下記者」的職務。因為按照中央社的規定，該社記者不能兼任他報記者，因此張兄對外採訪，從未暴露過新聞報記者的身份。如今時隔二十二年，而且他已離開中央社，故我今天可以將

這段業務秘密對外公開。任飛兄是我來臺後認識的第一位好友，現在雖然由於彼此的工作環境不同，很少見面，但彼此之間的深厚友誼是永遠存在的。

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變，對我們京滬駐臺記者，可說是一個很大的工作考驗。為時十天的全省大混亂局面，本來有很多事情可寫，但是我們顧全國家民族的利益，始終保持緘默態度，直到平靜以後我只寫了三千字左右的一篇通訊稿在新聞報國內要聞版刊出。京滬各大報對此事也只採用中央社的簡單報導，各報駐臺記者都避免作詳盡的描寫。

我自滬抵臺時，臺灣最大的報紙是新生報和中華日報，新生報雄踞臺北，社長為李萬居先生；中華日報獨霸臺南，社長為盧冠羣先生。中華日報出臺北版及新生報出高雄版都是以後的事。當時競爭得最激烈的也是這兩家報紙。魏伯聰先生主臺以後，新生報改組，李萬居先生離開新生報，另行創公論報，開始也辦得有聲有色，後來由於經營不當，日走下坡。此外還有和平日報（

以後恢復掃蕩報的原名)、全民日報、國是日報、平言日報等。中華日報的採訪主任，最初是林世璋兄，以後由錢塘江兄繼任，新生報的採訪主任改組之前是蔡狄兄。在採訪方面中華和新生競爭得最爲劇烈。

京滬各報駐臺記者來臺最早的是申報江暮雲，最晚的是大公報呂德潤。江暮雲不久離臺返滬，申報當局乃派吳守仁兄來臺接替他，吳兄仍在臺北，不過現已脫離新聞界，經營其他業務。當時的大公報，無論在採訪和業務方面，對臺灣都很重視。光復之初，該報就派本省籍的何添福君來臺發行航空版，後又派嚴慶澍來臺主持業務。直到上海淪陷，該報在臺的航空版才停止發行。該報如不投匪，國人還不會憎恨它。

京滬各大報當時雖都派有記者駐臺，但大多是兼任，真正專業而又每天都採訪新聞並拍發專電的，只有新、申及大公三報的記者。我和申報與大公報記者每天見面，私人之間的感情也還不錯，不過遇着重大新聞發生採訪時還是各顯神通，競爭得相當激烈。我與江暮雲的第一次競爭，是採訪蘭嶼科學考察團的新聞。

三十六年五月下旬，由臺灣海洋研究所、省地質調查所、省氣象局(以後改稱氣象所)等單位所組織的蘭嶼科學考察團自臺北出發，於同月三十一日在蘭嶼的東清灣登陸。各報都未派記者隨行採訪。光復之初，交通困難，除極少數氣象人員外，沒有其他的人前往蘭嶼。該團到達蘭嶼時，原擬逗留一個月，因氣候惡劣，物資供應不便，團員患病的極多，故決定提前十多天返臺北。在該團尚未離開蘭嶼以前，我於六月十二日前

往氣象局，向對蘭嶼情況了解最多的觀測科長王仁煜採訪，他除口頭向我說明以外，並將檔案和照片拿給我。我問他該局參加考察團的人員最近有無書面報告寄回來，他於是將該局職員楊志堅君寄回的兩封厚厚的信給我，我抄錄檔案中的要點並拿到幾張珍貴的照片。任務完畢，正要告辭時，江暮雲也來了。真所謂不是冤家不碰頭，他問我來氣象局的目的，我說我是到女師附小接小孩，因下課時間未到，故順便到氣象局和王科長聊天。並馬上和他盪扯一頓，使他沒有機會談正經事。閒聊了十多分鐘，已到中午下班時間，他也只好和我同時向王科長告辭，但我所得到的資料，他一個字也沒有。

同年七月，氣象局長石廷漢籌組新高山科學考察團，團員包括地質、農業、林業、博物、氣象等專家，在非洲撞車身故的金城教授當時就是團員之一。在籌組時我就悄悄地向石廷漢團長報名，不知是什麼原因，本地同業無一人參加，我還以為我可以獨佔此一新聞，但第二天江暮雲也參加了。全團十五人於八月一日出發，新聞記者只有我和江暮雲兩人。

在臺灣制讓日本以前，新高山原名玉山，日據時代，日人以該山主峯較富士山高出二百公尺，於是早准日皇更名爲新高山，光復後大家還是稱它爲新高山。因爲二次大戰時自阿里山登山道路失修，光復後除氣象人員外，沒有別的人上山。考察團登山，是光復後的創舉。全團人員於二日自嘉義乘森林鐵路火車赴阿里山，三日晨出發登山，晚宿鹿林山莊，四日繼續前進，當晚抵達北峯氣象臺宿舍，因高山氣壓太低，團員中不少

人患高山病，頭痛嘔吐，我也是其中之一。入夜室外溫度在攝氏零度以下，重裘不暖。五日登海拔三千九百五十公尺的主峯。登峯後回到宿舍，我和江暮雲各擬新聞電一則，由氣象臺電臺拍往臺北氣象局，由該局轉送新、申兩報辦事處，再由兩辦事處轉送電信局拍往上海，新、申兩報於六日在最顯著的地位刊出此項專電，江暮雲和我在發電後告石廷漢團長說：我們是中國新聞史上最先在國境內最高處採訪消息及拍新聞電的記者。當時雖是戲言，但也是事實。因此山比四川峨眉山還高八百五十公尺，除青海、西康、西藏等地區外，內地各省山嶽，沒有比它再高的了。全團於六日下午，八日抵嘉義，當晚在嘉義旅社開會，決議用考察團名義，呈請省府下令廢除新高山名稱，恢復玉山原名。省府不久正式下令恢復原名。我現在是中華民國唯一參加過玉山更名的新聞記者了。

回臺北以後，我和江暮雲兩人「作文比賽」，新、申兩報各以很顯著的地位刊登我們的特寫和照片，一個星期的辛勞總算沒有白費。第二次的競爭，打了一個平手。

我和江暮雲的第三次新聞競爭發生於三十七年二月中旬，競爭的對象是臺大國文系教授許壽裳被兇殺的新聞。

許教授是魯迅生前的至友，與魯迅既爲紹興同鄉，又在日本同學，也是魯迅對作品最有研究的人。在我國文化教育界爲知名之士，光復後來臺，任臺灣省長官公署編譯館館長，省政改制後編譯館撤銷，許氏乃就任臺大國文系主任，但魏伯聰主席仍聘他爲省府參議。他的長公子許世瑛

在當時在師範學院教國文，最小的女兒許世璋在臺大讀書，和她老父住在臺北市温州街六號一棟寬敞的日式住宅裏。但許氏突然於二月十八日午夜在床上被人用刀殺死，次晨才被他女兒發現報警。由於許氏在文教界的地位相當重要，不但本地新聞同業重視此一新聞，我們滬報駐臺記者也覺得非常重要，所以必須加強採訪。

首先供給給我此一線索的是省新聞處秘書楊鳴濤兄。楊兄於十九日午告訴我來臺灣後最重要的社會新聞線索後，我就連忙騎腳踏車趕到温州街六號現報，看見許氏的屍體躺在床上，覆以白毯。室內書籍文稿，都被翻閱，異常零亂，據死者的女兒世璋小姐告訴我，她父親昨晚九時就寢，至今晨六時半始發現其被人殺死，計面部被砍一刀，頭部被砍數刀。兇器鐵刀一把遺於室內，除皮箱一口不見外，其餘衣物都無遺失。我離開現場後，又分別訪問死者生前友好臺大校長陸志鴻、文學院院長錢歌川、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談死者生前情形及反對該案的看法，最後再向辦案的警務人員採訪。當時省警務處長王民寧，副處長是劉戈青。劉氏是著名的刑事專家。慘案發生後，有人懷疑其中可能含有政治因素，故王處長和劉副處長均親自指揮有關人員偵辦該案，務期偵獲真兇，使真相大白於世。

死者被刺殺前不久，臺北市外勤記者聯誼會還邀請過許氏演講。我為外聯會會員之一，也曾參與接待。對他談吐風趣，和藹可親及學問淵博，留有很深刻的印象。對於這位六十六歲的學者突然死於非命，心裏也很感惋惜和哀悼。

案發的第二天，不但我們新聞記者不知道這

一傷天害理的慘案究係何人所為，就是警方也摸不着頭腦。所以我在晚間就將該案發生經過及現場採訪拍發新聞電報，次日更加強採訪，除將最新消息於晚間發電以外，白天就將治喪善後及整個案情的每一細節寫成特寫稿，用航快寄出，向讀者作有系統的報導。無論是電報還是特寫，新聞報都在文教版以最著的地位刊登出來，而且一個字也沒有刪削。此種處理手法對採訪人員是很大的鼓勵。

二十二日晚間十點多鐘，王民寧處長招待記者，宣佈許氏被謀殺案業已偵破，兇手是死者生前曾經雇用過的青年工友高萬俤。高某進室行竊時將被害人驚醒，被害人用手電筒照射他，他見被害人認識他，於是抽出帶去的刀子將許氏殺死。十時宣佈破案，對本地報紙沒有什麼不利的影響，但對我們滬報駐臺記者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因為當時臺北電信局的設備甚差，凡是十時以後發出的新聞電，通常是次晚才能到達報社，當晚無法採用。因此我和江暮雲到達省警務處後，江說今晚電報發不出，抱怨警方宣佈得太晚，我沒有插嘴，心裏却另有打算。即在王氏報告破案說出兇手姓名和殺人動機時，我就藉解小便為由偷偷跑到電信局去發了幾十個字的電報，大意是說高萬俤行竊殺人，已供認不諱。電信局晚班業務員和我很熟，我再三拜託他這則消息今晚無論如何要發到上海報館，他很合作，保證立即拍發。當我趕回警務處時，王民寧的記者招待會尚在進行，江暮雲還在原來的座位上用筆記錄。等到招待會結束，大家離開警務處時，已是晚間十一點鐘。當晚我運用所有資料寫成五千字的一篇

通訊，並配上照片，第二天寄出，第三天全部刊出。

次日上海各報到達臺北，許案偵破變成新聞報的獨家新聞。那時大公報的呂德潤、嚴慶澍都未來臺，其他各報記者都是兼任，只寫通訊，不發電報，因此，我的競爭對手只有江暮雲，打破他，我的新聞就變成了專有。事後我接到總編輯趙敏恒先生的嘉獎電報，他讚揚我的電報和通訊「迅速精彩」。這是我來臺後第二次在採訪方面獲得頂頭上司的嘉獎，第一次得獎是「奇女子趙志貞」通訊他極欣賞，親筆寫信向我道賀，因為此事不及許案的重要，所以在本文裏我就略而不提了。

我和江暮雲競爭，有時也打敗仗，取得最慘的是有關張學良的新聞。

三十六年五月，國府委員莫德惠自京來臺，到竹東井上溫泉探視少帥，返回臺北後，柳老住在草山第一賓館，張任飛、江暮雲和我三人前往訪問，柳老除將探視經過很詳盡地告訴我們以外，並把他和少帥打網球時合攝的照片一張送給我們。那張照片裏面的人物除柳老、少帥以外，還有趙四小姐一荻及負責保護張氏安全已十餘年的國防部專員劉乙光少將。回到臺北，我寫了三千字的通訊稿一篇，連忙送往郵局用航空快信寄往上海，預計當晚可以到達報社。照片則拿到照相館翻印，我和江暮雲各分一張。取出以後，因時間已晚，不能投郵，於是改變計劃，送到中航公司託牛天文兄帶往上海。這時我才發現江的通訊稿未郵寄，而是連同照片一起交給牛兄。第二天，申報的通訊和照片，全部出籠，圖文並茂。新聞

報只刊出照片，通訊稿隻字未登，後來才知道我的文稿較申報晚一天到達，通訊已成明日黃花，那有補登之理。幸虧那張名貴的照片已經刊出，否則我真無臉見人。世人都想一睹芳容的趙四小姐，總算讓讀者從新、申兩報上得睹廬山真面目。

光復以後，大員不斷來臺視察，各界名流也陸續來臺觀光，除三十五年十月第一次光復節時蔣主席蒞臺的盛大場面新聞我沒有趕上採訪以外，其餘如孫哲生、張岳軍、何敬之、白健生諸先生來臺，我都參加採訪，尤其是胡適之先生第一次抵臺時給我的印象，更加深刻。

三十八年初，胡適之先生偕新任教育部部長杭立武自滬飛抵臺北，到機場歡迎的計有王世杰、傅斯年、杜聰明、浦薛鳳等數百人。我上前向他採訪時，他告訴我來臺看看，並稱，五十四年前乙未，他還是個小孩，他父親任臺東州知州，他隨父在臺住過兩年，先住臺南，後住臺東。馬關條約簽訂後遷往上海。我問他打算在臺停留多久，他手指身旁的傅斯年校長說：「這要聽我上司的支配。」傅氏聳肩答辯道：「我不是你的上司，我不是你的上司。」當日下午三時，胡氏又在福州路臺大傅校長公館正式招待記者，本外地同業前往採訪的達數十人之多。他除詳談他父親五十四年前在臺情形外，並對當時的世界大局和國內政情發表意見，對於各同業所提出的問題，都逐一答覆。大家都滿載而歸。

第四天的下午二時半，胡先生在中山堂公開演講，講題為「中國文化的自由傳統」，樓上樓下都擠得滿滿的，聽眾達六七千人，打破光復以

來一切集會的紀錄。

在三十六、三十七兩年當中，本外地同業在採訪消息時經常見面的除上面已提到者外，尚有雷樹水、鍾長江、劉昌平、馬克任、史習枚、林鵬、陳維祥、陳石安、朱永丹、江平成、卓宗吟、周君平、林伊祝、陳玉慶、王時、蕭鐵、王正、師道弘、鍾中培、簡潤芝、黃順華、林克明、徐雪影、林現、劉宗周、黃耀鏞諸兄，除蕭鐵兄逝世多年外，有的已經改行，有的已離臺灣。不過大都仍在新聞界工作。其中劉昌平已榮任聯合報副社長，馬克任兄榮任總編輯，為二十年前的外勤同業揚眉吐氣不少。其餘諸兄也十餘年如一日，仍在外勤崗位上工作。這種敬業樂業的精神，最令人欽佩。朱永丹兄現任法新社駐臺特派員，賺的是美鈔，更是名利雙收。錢塘江兄現任中華日報副總編輯，鍾長江兄任中華日報南版採訪主任多年，可見寶刀未老。只有我這個不學無術的老朽，兩鬢如霜，早已自外勤中退役，現在中央日報編輯部混日子，最沒有出息。

在本文中我要順便一提的是亡友蕭鐵。他現在臺北的老友前掃蕩報林版副總編輯程曉華兄一樣，是掃蕩報開國元勳之一，抗戰時任掃蕩報桂林版副刊編輯，勝利後來臺，先後在省黨部、中央社、公論報及中廣公司工作，於十餘年前因肝病在臺大醫院逝世。彌留時要他夫人張麩女士通知我，說有話要對我說。等我趕到病牀旁邊，他已斷氣。他是湖南長沙人，父母都在故鄉，而且年事已高，他是獨子。他夫人和我都不知二老的詳盡住址。他要說而未說的話不知是否要我在他死後設法告訴他在鐵幕內的雙親他已不在人

世。這是我至今仍深感遺憾的一件事。他是編採全才，又長於文藝寫作。英年早逝，是我國新聞界的一大損失。

光復初期的臺北市外勤記者聯誼會，也有聲有色。第一任理事長好像是林世璋兄。以後每年改選一次。外聯會的活動限於同業進修及康樂活動，經常請專家、學者舉行座談或學術演講，有時也舉辦晚會或球賽。那時大家都很年輕，一切公私生活，都充滿了蓬勃的朝氣。

在三十六、七兩年中，省府新聞處長是林榮貴先生。他自己是記者出身，對於記者在工作上需要，了解得最為深切，因此他協助各記者採訪，無不盡力而為，大家也很和他合作，很多同業都稱他為「記者之友」。此一「封號」決非阿諛之辭，而是百分之百的寫實。

敬請

批評指教

歡迎

訂閱投稿